

基督教傳道人、留學生、買辦與革命者—— 宋耀如、陸皓東以及孫中山關係初探¹

顧衛民

曉生兄：宋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一世，而上海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之談。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

——孫中山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曉生信

宋耀如是近代中國早期少數的特立獨行之士，他的名字就反映出他奇特而又曲折的人生經歷。他本姓韓，是其父韓鴻翼的第三個兒子。他於1863年2月出生於當時廣東省文昌縣城西郊的貧寒農家。²他的家族有客家人血統。12歲時，他過繼給沒有子女的舅父，改名宋耀如。後來在美國入教時所用的名字是查理·鐘斯·宋（Charlie Jones Soon），查理·宋很可能是宋耀如一個英國化的表述（Anglicized version），但奇怪的是當中還加了一個鐘斯（Jones）。沒過幾年，他在姓氏宋（Soon）的英文後面又加了一個尾綴「g」，變成「Soong」。據說宋耀如回國以後，當時在《萬國公報》任中文主筆的沈毓桂替他改名為曜如，字嘉澍。曜與耀相同，如同普照大地之光輝；嘉澍一詞則出於《後漢書·明帝紀》中的「冀

¹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恩師李志剛牧師的精心指導。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與筆者一同受業於陳旭麓老師的大學長沈渭濱教授、上海華東神學院圖書館館長陳桂照牧師、上海景靈堂余江牧師提供了熱忱的幫助，謹致誠摯的感謝。筆者在2011年10月20日訪問了位於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博物館，受到該館研究室主任黃建敏教授、李甯先生和漆德紅小姐的熱忱接待，他們陪同筆者參觀了孫中山和陸皓東故居、陸皓東墳場、馮氏宗祠、北帝廟原址、陸燦故居、楊鶴齡墓以及中山紀念中學等史跡，大大豐富了筆者的感性知識，他們的情誼，是筆者永遠難忘的。

² 目前宋氏的故居位於中國海南省文昌市灑鎮古路園村，距海口市80公里，距文昌市約30公里。原建築物已不復存在，現今建築於1985年重修。

濛濛嘉樹」之典故，意為及時雨的灌溉。³然而，在當時人們往來書信及後來的歷史著作中他又被稱為宋嘉樹。

宋耀如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可謂波瀾壯闊，與當時絕大部分固守家園、不聞外洋事物的中國人迥然而異。當然，這種生活也並非他自己的選擇，而是其命運使然。1875年，12歲的宋耀如被舅父帶離家鄉，遠渡重洋，去了北美的波士頓，與當時成百上千的文昌縣飄洋出海的年青華工一樣，成為身處異域的華人打工仔。他先在波士頓舅父的絲茶行裏做事，並正式被舅父收為養子，改姓宋氏。他想讀書，卻遭養父拒絕。性格倔強而獨立的宋耀如離開了養父的絲茶號，浪跡天涯。期間，他得到一名美國聯邦海軍軍官查理·鐘斯（Charlie Jones）的收留。這位軍官是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北方軍中的老戰士，曾經與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握過手、談過話，是個熱忱的廢奴主義者。宋在查理的影響之下畢其一生都為忠實的林肯主義者，他剪下了腦後的辮子，並對自己說：「從那時起，我自己在心靈上皈依了基督教，崇拜林肯。」⁴但此時他尚未正式入教。查理推薦宋耀如去美國海軍的一艘緝私艇上服役，他因表現出色得到船長艾立克·加布理爾的欣賞。在這位艦長的幫助之下，他脫下戎裝，於1880年在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美國監理公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受洗入教。為了紀念在精神和物質上都給了他極大幫助的查理·鐘斯，宋用了他的名字作為教名。在後來的西方，他的本名反而不彰。⁵

1881年，受監理公會的委託，德罕姆（Durham）著名的實業家和慈善家、監理公會信徒及該會所辦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董事卡爾（Julian Carr）成為宋耀如的監護人，⁶不久即安排他進入了三一學院。三一學院最早可以追溯到1838年，它開始叫布朗學校（Brown's Schoolhouse），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蘭道夫郡（Randolph County），即今

3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有關宋耀如的文獻記載極少，本書是一部歷史紀實文學，而因為作者是歷史學家，其後記中稱在撰寫的過程中採訪了宋氏家族中的許多人氏，遍查公私檔案。在文獻資料奇缺的情形之下，本文以此書作為撰文的依據。沈渭濱教授指出，此書「雖不可盡信，但相信不是杜撰」。見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探索與爭鳴》第8期（2009），頁28。

4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17。

5 同上。

6 John Egerton, "The Rise of a Southern Star: Duke University," *Change*, Vol. 5, No. 10 (Winter, 1973/1974), pp. 28-35.

天的三一城 (town of Trinity)。1841年，由美以美會 (Methodist) 和貴格會 (Quakers) 的聯會差會機構 (Union Institute Society) 的領導人布朗特萊·約克 (Brantley York) 接管。1851年北卡羅萊納州在法律上承認它是一所正規的學校 (Normal College)。美以美會的佈道家可以在學校中教書，同時學校也奉行「自由教育」(free education) 的原則。1859年正式改名為三一學院，教訓為「*Eruditio et Religio*」(即知識與虔誠)。⁷1887年這所學校遷到德罕姆，並接受了當時美國著名的煙草工業家和慈善家，美以美會信徒杜克 (Washington Duke, 1820-1905) 的資助。到1924年，杜克的兒子詹姆斯·杜克 (James B. Duke) 以400萬美金設立基金，校董會決定將校命名為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宋耀如於1881年入學，成為該校歷史上第一名外國學生。儘管宋耀如在該學院沒有拿到任何資格證書，教會還是希望培養他成為日後去中國的傳教士，他們讓他學習英語和聖經，他完成了一年的大學預科課程，於1882年進入萬德畢爾特大學就讀 (Vanderbilt University)，這座私立的研究型大學建於1873年，位於田納西州 (Tennessee) 的納斯維利 (Nashville)，以當時從事鐵路以及輪船的著名實業家萬德畢爾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的名字命名，這位實業家和慈善家住在北方，沒有到過南方。但他捐獻給南方100萬美元建立大學，希望彌合南北戰爭留下的創傷。⁸1885年，宋耀如結束了在該校的學業，被監理公會按立為傳道人，年底被派回上海傳教。

美國的監理公會淵源於美國的衛斯理宗教會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初創於1784年。1844年，因黑奴制度的爭執，發生南北教會的

7 卡爾原名Julian Shakespeare Carr (1845-1924)，北卡羅萊納州的工業家和慈善家，其夫人名那妮 (Nannie Carr)。他的父親是出生於教堂山 (Chapel Hill) 的商人約翰·卡爾 (John C. Carr)。他早年求學於教堂山的北卡羅萊納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後因參加聯邦軍隊中斷學業。他因長期在軍隊服務，慷慨大度地資助和照顧軍人的寡婦以及子女，人稱「卡爾將軍」。內戰結束以後，他成為德罕姆的煙草公司 (W. T. Blackwell and Co Tobacco Factory) 的合夥人，因其極為敏銳的經營能力而獲得巨大的成功。他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工業家之一，以後他還成功地經營了紡織業、銀行業、鐵路以及電燈照明等公用事業以及報業。

8 萬德畢爾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1794-1877)，美國工業家和慈善家，蒸汽輪船和鐵路大王，控制有紐約和哈雷姆鐵路 (New York and Harlem Railroad, 1863)、赫德遜河鐵路 (Hudson River Railroad, 1864)、紐約中央鐵路 (New York Central Railway, 1873)、湖岸與南密西根鐵路 (Lake Shore and Michigan Southern Railway, 1873)、密西根中央鐵路 (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 1877) 以及西岸鐵路 (Western Shore Railway, 1885) 等多條美國重要的鐵路幹線。在美國內戰時期，他多方支持北方的聯邦政府以及軍隊。T. J. Stiles, *The First Tycoon: The Epic Life of Cornelius Vanderbilt* (New York: Knopf, 2009)。

分裂，⁹南方教會稱為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中國，南方的稱為監理公會，北方稱為美以美會。¹⁰在南北方教會分裂前十多年，該教會內部已經討論到東方傳教的地點和工作，當時許多傳教士都認為中國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地方。1847年，美以美會派兩名傳教士搭帆船到中國福州。¹¹監理公會則於1848年4月28日派秦右（Rev. B. Jenkins, D.D.）和戴醫生（Rev. Chas. Taylor, M.D.D.D.）從波士頓搭船來華，8月中旬始抵香港。秦右夫人生病，暫留香港，戴醫生則與夫人於9月抵上海。當時的上海開埠不久，商旅雲集，監理公會也以上海地處華東沿海的交通要道，便以此地為宣教的中心。戴醫生以及稍後抵上海的秦右，於1849年在臨近王家碼頭的地方，購置土地，建造教堂和會所，當時的教堂取名福音堂，於1850年落成，以後又建兩所小學以及一所女學校。1853年，監理公會總佈道會又派耿惠廉（Rev. W. G. E. Cunyngham, D.D.）在上海虹橋建立第二個教堂，名化善堂。1854年，先回美國，又返中國的秦右攜唐雅各（Rev. J. L. Belton）、雷大衛（Rev. D. C. Kelley, D.D.）以及藍柏（Rev. J. W. Lambuth, D.D.）三位教士來華；1859年，總佈道會又派林樂知（Rev. Young J. Allen LL, D.D.D.）¹²和華美德（Rev. M. L. Wood）來華，他們於1860年7月抵上海，居鄭家木橋監理公會住宅內。當時藍柏得到太平天國政權所發給的旗幟，與中國傳道人劉竹松到蘇州開闢傳教區，新來的林樂知也在上海四鄉的南翔、青浦、嘉定旅行傳道。1861年，美國南北開戰，總佈道會的經濟大受影響，有些傳教士回國，林樂知則進上海製造局辦事，兼任上海廣方言館的教習，藍柏則出任駐上海的美國副領事

9 美以美會的創立者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對美國的奴隸制曾表示出十分震驚。當1784年美以美會在美國創立時，曾公開表態反對奴隸制度。到19世紀早期的時候，由於富有又擁有奴隸的南方信徒增加，教會反對奴隸制度的態度就不那麼堅定了。北方的神職人員致力於解放黑奴，但在南方，奴隸制仍然是合法的。1840年，有一位生活在喬治亞（Georgia）的牛津（Oxford）的美以美會主教安德魯（James Osgood Andrew）擁有一名奴隸，美以美會總會討論了這件事，但沒有驅逐他。1844年，他結婚時太太又帶了一名奴隸來到他的家庭，所以他擁有了兩名奴隸。這年，總議會開會，讓這位主教停職，直到他不再擁有奴隸為止。總議會上的南方代表對此決議表示異議，這年，南方的教會正式分離，成立監理公會。以後南方的監理公會發展很快。據1860年的統計，在冊信徒有757,205人，其中537,136人為白人。1858年增加了37,442人，同年它擁有106所學校和學院。監理公會在政治上的態度一般被認為比較保守，他們不僅主張保留奴隸制，對來自非洲裔的美國信徒亦不友善。美國內戰結束以後，許多非洲裔的美國信徒離開了他們的教會，另創「非洲裔的美以美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Thomas A Tweed. "John Wesley Slept Here: American Shrines and American Methodist," *Numen*, Vol. 47, No. 1 (2000), pp. 41-68; Raymond C. Rymph & Jeffrey K. Hadden. "The Persistence of Regionalism in Racial Attitudes of Methodist Clergy," *Social Forces*, Vol. 49, No. 1. (Sep. 1970), pp. 41-50.

10 毛吟榭纂輯，周承恩考訂，〈中華監理公會小史〉，《中華監理公會議會五十周年紀念刊》（上海，1935年10月），頁1-4。

11 同上。

12 同上。

兼做佈道工作，秦右於1860年索性受任於美國駐滬領事，不過於次年去世，葬上海八仙橋西人公墓。直到1870年中期以後，教務才恢復。1875年，潘慎文 (Rev. A. P. Park, D.D.) 來華任傳道及興辦學塾事宜，次年，慕文會監 (Bishop Marvin) 來滬視察教務，又過一年，藍柏之子藍華德醫生 (Rev. W. R. Lambuth, M.D.D.D.) 來華行醫傳教。1878年女教士雷金貞 (Lochine Rankin) 和妹妹雷金義 (Dora Rankin) 也到南翔開教並創辦學校 (中西書塾)。當時監理公會在鄭家木橋建立一較大的「福音堂」；又創「美華書坊」，印刷教會書籍及佈道單張，為滬上鉛印鼻祖；又在蘇州天賜莊 (原名天師莊) 開設「中西醫院」，即後來著名的「博習醫院」；1881年，又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由林樂知任監院。

宋耀如於1885年底監理公會派遣回中國傳教。¹³據《中華監理公會第一屆年議會記錄》，在1886年11月17日上午9時30分，中華監理公會第一屆年議會在上海林樂知住宅開會，自24日上午10時30分閉會，由潘慎文擔任臨時書記。「林樂知、孫樂文、劉樂義、馮昌黎由北美喬治城議會推薦而來，李德 (Rev. C. F. Reid) 由肯塔基議會推薦而來；潘慎文由密蘇利議會推薦而來，而北加羅利那年議會第一班宋耀如 (即宋教准) 亦於同時移入。」¹⁴可見此時宋耀如已經開始了他的傳道工作，當時監理公會在上海以及蘇州周圍地區共有29個牧境，宋開始活動的是兩個很重要的堂口，一是慕爾堂 (Moore Memorial Church, 即今天的慕恩堂)，創始於1887年，初創於上海雲南路，後遷於西藏路；另一個則為景林堂，創始人為林樂知，初建於1882年，地點在上海崑山路。¹⁵當時的監理公會分為聖日學部、學塾部、佈道部、建堂部和董事部，宋耀如被安排在建堂部，同時有馮昌黎、林樂知、潘慎文以及柏樂文諸教士。但後來不久即被派往上海周邊的郊區崑山，七寶和青浦和太倉出任傳道員。¹⁶

13 毛吟榭纂輯，周承恩考訂，〈中華監理公會小史〉，頁4。

14 〈中華監理公會第一屆年議會記錄〉，《中華監理公會議會五十周年紀念冊》，頁62。

15 毛吟榭，〈中華監理公會各堂紀年簡表〉，《中華監理公會五十周年紀念冊》，頁72-73；由景林堂余江牧師提供之《景林堂小史》。在宋耀如任傳道員的時代，監理公會在上海的財業有西教士住宅7所，價值26000銀元；中國牧師住宅3所，價值3300元；中西書院有西教習2人，學生79人，產業價值56000銀元，博習書院有西教習1人，中國教習2人，學生36人，產業價值6900元；另有女佈道會開設之學堂，有西教習7人，中國教習23人，學生511人，產業價值4500元 (含西教士住宅內)。參上註。

16 毛吟榭纂輯，周承恩考訂，〈中華監理公會小史〉，頁4。

根據《監理公會的綱例》，¹⁷宋耀如作為一個傳道人應該履行以下的職責：（一）主持婚禮；（二）當長老和監督不在時，施行洗禮；（三）當長老和監督不在時，循環各教堂主持禮拜之事，並將各堂口的情況向長老報告；（四）循綱例收進、審問以及革出教友；（五）每年至少一次領將綱例宣讀給信徒聽；（六）當長老不在的時候，須主持每季季度的季會，要報告本季進教、病亡、遷移、退教、革出事宜以循環佈道情形；（七）要為教徒登記造冊，記錄其住址，以便探望，中西教徒要分開記錄，並記錄如何進教以及將來出路；（八）將有關主日學校的情形，如學生人數、名單、家課、圖書收藏記錄在冊；（九）特別要求信徒關注自己子女的教育，要鼓勵子女入教會辦的學塾接受教育，最好要入本會的學塾學習；（十）接受信徒的捐款，特別要將這些捐款用於資助傳道學堂之事；（十一）要將捐款分發恤款之情形，交給理捐部。¹⁸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宋耀如與監理公會當局，尤其與林樂知的關係並不融洽愉快，這是導致後來他離開監理公會的原因。據于醒民、唐繼無所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傳》的記錄，監理會當局林樂知牧師與宋耀如之間的衝突由幾件事情引發：（一）1889年秋，美國監理會中國教區要選舉一名代表，參加在美國田納西州總部召開的會議，林樂知在當時是重要的人選，但宋耀如得知消息以後，「他像着了魔似地行動起來」，逐個說服各個牧區的教士，並徵集中國信徒的簽名，推選蘇州教區的曹子實牧師為代表，據稱，為推動此事，「凡有中國教徒的地方幾乎都留下了他那輛單人馬車的輪跡」。結果曹子實牧師果然被選派為前往總議會的代表，這自然使林樂知不悅。（二）189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排華結案，除外交官及隨行人員以外，中國人一律不得入境或重返美國，對運載華人入境的船主處以重罰；華人不能證明其入境合法手續者，罰作苦工一年，並驅逐出境。宋耀如與當時聖公會的中國牧師顏永京、吳虹玉以及牛尚周、溫秉忠商議後，策動《萬國公報》的中文撰稿人袁康，以顏永京和袁康兩人的名義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抗議的文稿，為林樂知所不悅；（三）同年5月30日，美國監理會中國教區在上海慕爾堂開會，討論上海三一堂自養的事宜，宋的意見與林樂知完全背道而馳，最後在

17 當1887年慕文會監訪華巡視教務時，該會《綱例》尚未被譯為中文，但不久以後被譯成中文，以後迭加修訂。

18 《監理公會綱例》（民國元年改正本，無出版地點），頁50-55。

林樂知萬所舉行的辯論會上，宋耀如剪掉了他的辮子（宋在美國時已經剪去辮子，回國時又蓄髮）說：「從此，我同中國的半奴隸制決裂，同你們——不公正的監理會決裂！」¹⁹

2011年9月18日下午，筆者訪問上海景靈堂（即原景林堂），遇主任牧師余江先生，彼告知據該堂老教友得自於宋家的口傳，宋耀如與林樂知之間的不和有如下的原因：（一）當宋氏在上海初次面見林樂知時，林坐着講話，而宋一直站着，宋心裏認為這是西教士對他的不尊重；（二）林要宋立即去昆山等地當傳道員，但宋卻因去國日久，想先回廣東文昌省親，林認為宋沒有將教會的利益置於首要的位置；（三）林以及其他一些西教士並不滿意宋在上海周邊地區的傳道工作，因為宋不會講上海方言，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宋倔強和叛逆的個性也很難令西教士接受；（四）林樂知等給宋的薪金只是一般中國傳道人的份額，令宋感到不滿。²⁰總而言之，雖然林樂知常自命「余美國人也，寓華日久，愛之深，不覺責之切」，但心裏仍然自認既然是他將上帝介紹給中國人的，自然地與中國人相比，他離上帝更近；但宋耀如卻偏偏不認同他的看法。²¹不過，宋的夫人倪桂珍並不願意離開監理公會，不僅如此，畢其一生，她還是監理公會中國傳教區最虔誠和最有影響的女信徒之一。自然，她從沒有在言行中干涉其丈夫的信念和心志，宋耀如也尊重她的意志自由，²²故監理公會一直稱「宋太太熱心服務教會」。²³

19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189、220。據李月峰《監理公會前輩中華牧師傳略》，宋耀如想要推薦的曹子實牧師是該會中國籍牧師中極有人望的老前輩，他字自齋，浙江嘉興人，「天性淳厚，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曹牧師志在傳道，而兼行醫，並注重教育，先在上海教授英文，後去蘇州十全街開堂佈道，並在天賜莊開辦博習醫院。光緒十九年，奉派為總議會代表。曾經譯有聖詩數首，並著有《聖經問答》等書。《中華監理公會五十周年紀念冊》，頁59。

20 2011年9月18日下午筆者訪問余江牧師的筆錄。在于醒民、唐繼無所著《宋氏家族第一人》中有不少宋氏的關於中國教會自立的言論，見該書頁215。另外，林樂知有關西方人優越於中國人的看法亦有跡可尋，他著有《印度隸英十二益說》（《新學彙編》卷一），有中國讀者眉批：「凡為此言者，豈勸我中華亦隸於英國乎？」「此言之可惡之至，教我中國依賴英人，嘻嘻！」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507。

21 2011年9月18日下午探訪問余江牧師筆錄。

22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225。

23 《中華監理公會五十周年紀念冊》，頁4。

二

思想激越、特立獨行的宋耀如與孫中山革命事業聯繫的契機，便是他與陸皓東的相識。被孫中山稱為「為民主共和犧牲之第一人」的陸皓東，其家庭雖然是廣東人，但家族及本人與上海一直有緣。據黃建敏教授所寫的《翠亨村》一書，陸家是在明朝嘉靖年間從離翠亨村約三公里處的隔田鄉敦和里（今中山市南朗鎮崖口管理區陸家村）遷來的。清道光年間，陸氏已是村中最富裕的家族，道光八年（1828），村中的北極殿第一次重修時，留有《重修翠亨村祖廟碑記》，捐款者以陸、楊、馮、孫四姓最多，其中陸仁車捐款最多，為五十二兩，是村中另一大姓楊家23位捐款者的款子總和二十三兩的兩倍多。黃教授據口傳史料指出：陸家的陸仁車、陸厚車兄弟都是廣州洋行的買辦。陸仁車名載德，號友山，「教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他在發跡之後回鄉廣置田產，舉目所屬，本鄉及鄰鄉的土地，都要強行買下。陸厚車，名元澤，號德潤，族譜上載其「教授登仕左郎」、「候選巡政廳」，他的兒子陸廷光即為陸皓東的父親，在上海做貨物轉運生意。陸皓東為家中的獨子。²⁴據陸氏親族陸燦（他是孫中山與陸皓東搗毀翠亨村中北極廟神像的目擊者之一，當時他是個小孩子）所著《我所認識的孫中山——童年朋友陸燦的回憶》一書所記：「陸公諱中桂，字獻香，號皓東，在上海出世（1867年9月12日）；父諱恩，字廷光，號曉帆，在上海業商，駁艇運貨，善畫工，稍有餘資。……十八歲時再往上海，習洋文不數月，在電報局翻譯電文。」²⁵

陸皓東出生於1867年9月12日，因其出生日為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故其小名為中桂。又有記載他的父親名懷昕，在翠亨村長大，成年後赴上海謀生，開始時在上海的洋行裏做師爺，從事貨物轉手貿易，後賺到錢以後自己也開始做生意，並寄錢回家鄉建屋和買地。陸皓東的父親娶有二妻一妾，生四女一子。陸皓東的生母王金悅為陸懷昕的元配夫人，為翠亨村附近王屋村人。據陸氏後人回憶，陸懷昕生前在上海是與同鄉

24 黃建敏，《翠亨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14-22。翠亨村為多姓氏聚集的華南村落，主要姓氏有楊、陸、馮、孫、陳、何、麥、蘇、梁等。陸氏家族中最早遷入翠亨村的是陸德蘭和陸邦桂叔姪，建於村中北極殿旁的陸家祠堂大門懸掛的匾額上書「蘭桂陸公祠」，侍奉兩人為定居祖。陸德蘭生於明弘治四十二年（1488），卒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陸邦桂生於明嘉靖二年（1532），卒於明萬曆八年（1580）。他們共同生活的年代在嘉靖二年至四十二年間，故陸家是在嘉靖年間來到翠亨村最早的村民之一。同上，頁15。

25 陸燦、Betty Tebbetts Taylor著，黃健民譯，歐冬紅校，《我所認識的孫逸仙——童年朋友陸燦的回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89-90。

鄭觀應合夥做生意的。陸燦所著〈陸皓東事略〉一文曰：「前滬寧鐵路總辦，旅滬呂人鄭陶齋君欽仰其人，認為誼子。」²⁶陸皓東11歲時，也就是1878年，他的父親在上海去世。他的命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隨母親護送父親的靈柩第一次回到故鄉翠亨，安葬了父親以後，他便在故鄉住了下來。陸皓東隨即進入村中設於馮氏宗祠的村塾讀書，與孫中山成了同學。據說少年的陸皓東「通羣經能文章，精圖畫、音樂與機器」，尤其喜愛繪畫，課間嘗畫《水滸》和《三國志》人物，塾師責備他不專心讀書，以為繪畫是浪費時間，陸皓東反駁說：「圖畫也是讀書的事，為甚麼要禁止呢？」

從陸皓東少年極為有限的記載中，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些事實：（一）陸皓東的祖父輩很可能是買辦，父親早年在上海經商，且與鄭觀應有來往，他應該屬於許多早期在上海的廣東香山商人羣體中的一位，他本人是否是買辦不得而知，但因為服務於洋行，所以一定與洋行和買辦有聯繫；（二）陸皓東經歷了一個家道中衰的過程。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他父親的死，他很可能和當時眾多的買辦子弟一樣，留在上海的教會學校裏接受教育（上海當時有這樣的學校），而不是回到他所不了解的故鄉的村塾，與那些在鄉下從來沒有見過外部世界的孩子一同接受中國傳統的鄉塾教育。這羣村民孩子中包括孫中山，孫中山長陸皓東一歲不到，前者生於1866年11月12日，後者生於1867年9月12日，前者於九歲即1875年開蒙，後者直到11歲即1878年開蒙；孫中山是在與陸皓東同學一年以後於1879年才從翠亨村取道澳門前往檀香山的。當時陸皓東所接受傳統的教育比孫中山更少，而眼界卻比同班的孩子更為寬闊。少年的陸皓東在上海已經養成了熱愛自由的性情，傳統死記硬背式的教育方法非但不能使他滿足，還可能引起他的反感，所以才有他和老師的爭論。陸燦回憶說：

對我們其他小朋友來說，陸皓東有些特別。他出生在大城市上海，比起我們，可謂見多識廣。他是一個優秀的學生，聰明的藝術家，還具有某些音樂家的氣質。他的觀點非常進步，和帝象一樣，不滿村民對滿洲政府的畏懼與麻木。他敏捷、活躍，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和無窮的好奇心，一旦被激發，就有狂熱的忠誠。²⁷

26 黃建敏，《翠亨村》，頁214。〈陸皓東事略〉一文現存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博物館。

27 黃建敏，《翠亨村》，頁216。

陸皓東在18歲時再去上海，時在1885年。他在上海時期主要學習電報，有跡象表明，陸皓東在少年時代即對科學感興趣，陸燦記曰：「他還喜愛奇器，晚間所攜燈仔，內自製抽力機器，水瓶一熱則在內活動，鄉人稱其為『奇人』。」²⁸有關陸皓東在上海學習電報的具體情況幾乎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說明，他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的自供中說：「……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²⁹據沈渭濱教授推測，陸皓東由滬返粵的時間當在1892年。³⁰也就是說，他在上海共住了七年的時間。當時的上海可能是全國電報業最為發達的城市。1851年英法之間設第一條英吉利海峽的海底電纜，而當時的清帝國仍然處於傳統的通訊時代；電報業初進上海在1860年代中期。1865年英商富利洋行自行架設由浦東小岬至黃浦江口金塘燈塔的電報線路，全長12至16英里；1868年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接通至法租界金利源碼頭的貨棧，全長二英里半；1870年至1871年英國—印度的電報線延伸至香港，英國大東電報公司與丹麥大北電報公司訂立聯線合同，規定大北公司向南不過香港，大東公司向北不過上海，南北電報聯線將在上海匯合，總理衙門也允許設立香港—上海海底電纜。1870年丹麥人史溫生（Saenson, ?-1921）任大北電報公司上海站的負責人，籌建香港—上海—長崎的水線，6月，大北公司從香港敷設水線至上海，同時敷設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長崎—上海的水線全長2237海裡。1871年4月，香港至上海的水線正式開通，這年，大北公司在遠東已經下轄上海、長崎、廈門以及香港的電報站，擁有六條海底電纜，連通上海、長崎、香港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城市，上海和長崎由此成為遠東兩大國際電報網的通訊中心。³¹1881年，盛宣懷創辦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家電報局，上海早報局由經元善為第一任電報局局長，租黃浦灘路（今中山東一路）8號招商局三層樓房為局址，它在早期

28 同上，頁89。一說陸皓東為再到上海的時間是19歲，即1886年。見何伯言編著，《陸皓東、史堅如》（青年出版社，1946），頁19。

29 〈陸皓東供詞〉，鄒魯，〈乙未廣州之役〉，《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229。但最近黃宇和先生出版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香港：中華書局，2011）認為這份供詞有可能並不是真實的。見該書頁594-597。他說：「儘管陸皓東受審時的確說過這樣的話，清吏也絕對不會把這種痛斥清廷的話照書如儀（除非他自己也想被殺頭）。又儘管陸皓東當時自己執筆直寫，主審官員也會當場撕毀以表示其效忠清廷，原稿是不會留下來的。」但之所以流傳下來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孫中山等革命黨籍以褒揚陸皓東；二是可能由南海縣令炮製，藉以堵住前來營救的美國領事的嘴巴。

30 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探索與爭鳴》第8期（2008），頁29。

31 羅蘇文，《上海：一座近代都市的小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92-193。

主要偏重於官方電報業務，初創時只有上海至天津一線。³²上海電報學堂初創於1882年，晚於上海電報局一年，專門培養電報專業的人才，它就是陸皓東最初就讀的學校，它的校址在胡香宅會香里（今福州路西藏中路東南轉角處），後移到鄭家木橋（今福建中路）。³³最初的學生僅20人，主要學習收發報技術，學制不定。學優者派至上海電報總局任職，缺額陸續考補，後因急需電報人才，學堂規模擴大，先後添設測量塾、按報塾、額外塾，1910年與上海電報高等學堂合併，移至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陸皓東在1885年入學，當時學堂才創辦三年，有關他的學業和畢業的情況，史無明文，只知畢業以後至上海電報局充領班生。³⁴

據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傳》所載，宋耀如與陸皓東相識於1889年6月間，介紹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批以及第二批留美幼童返國服務，分別在電報局和海關供職的牛尚周和溫秉忠。³⁵牛尚周和溫秉忠也是宋耀如的連襟，據羅蘇文的《上海：一座近代都市小傳》曰：

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是徐光啟的後裔，徐光啟的女兒嫁到倪家，倪家世代信奉天主教，直至倪桂珍的父親倪蘊山才改信基督新教。倪桂珍也是基督徒，她不纏足，畢業於裨文女校，會彈鋼琴。裨文女校是由美國基督教傳教士裨治文夫人(Eliza Gillette)於1850年創辦的，是近代上海第一所教會女校。倪桂珍三姐妹分別嫁給三位留美學生(宋耀如、牛尚周、溫秉忠)，後兩位都是晚清留美幼童，在他們的家屬、婚姻和社交網路中，教會、留學生是重要的紐帶……³⁶

倪桂珍的兩位姐妹分別是倪桂清(嫁牛尚周)和倪桂殊(嫁給溫秉忠)。香港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最近出版的新著《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一書記載了溫秉忠之父溫清溪(1843-1915)在跑馬地的墓地，原來溫清溪先生原籍廣東台山大步頭堡鄉，早

32 薛理勇主編，《上海掌故》(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頁6。

33 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頁29。據查監理公會傳教士藍柏夫婦在1870年左右在鄭家木橋亦辦過一所學校，後又建造一禮拜堂，名福音堂，這是宋常來常往的地方。

34 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頁29。

35 羅蘇文，《上海：一座近代都市的小傳》，頁193-194。

36 同上。

年務農，後到廣州習工藝，又到香港經商，接觸到基督教，隨倫敦會牧師理雅各 (Rev. James Legge, 1815-1897) 遊學，1864年受洗，1872年按立為倫敦會執事，是籌建道濟會堂的重要人物。他和為孫中山和陸皓東施洗的喜嘉理牧師 (Rev. Charles Hager) 亦有淵源關係，1883年喜嘉理來香港時，即住在溫清溪名下的寓所，捐資協助喜牧師成立「美華自理會」，讓出物業籌建香港公理堂，這正是孫中山和陸皓東受洗的教堂。該書記溫秉忠事曰：

溫家與關元昌家族是世交，同為香港有名的基督教世家，溫清溪子溫秉忠為1873年清政府派到美國留學的留美幼童。留美期間，溫秉忠已經常與友人討論政事，主張以西學方式作為改革方法；又與好友牛尚周結識來自廣東的宋耀如（即宋靄玲、慶齡及美齡三姐妹的父親），志趣相同而成為摯友。回國以後，秉忠與關元昌五女月屏（1865-1899）締結姻緣。關月屏離世後，秉忠再和倪氏女子結婚，其再婚妻子乃宋耀如妻之姐妹。³⁷

據勒法吉 (Thomas la Fargue) 所著《中國幼童留美史》一書載，牛尚周 (New Shan Chow) 生於1861年，為1872年第一批被選的留美幼童，江蘇嘉定人，出國時11歲；1881年返國時20歲，曾任職於江南製造局。並在上海電報學堂以及電報局服務；溫秉忠 (Won Bing Chung)，廣東新寧人，也是被選派的第一批留美幼童，生於1860年，出國時12歲，回國時21歲，曾任職於北京海關。³⁸由於牛尚周供職於電報局，因此與陸皓東的相識是可能的，而且是很自然的。據稱陸皓東於1889年6月前往太倉面見正在那裏傳道的宋耀如時帶有牛、溫二人的介紹信，上面只有一句話：「他就是你想想找的那種人。」³⁹另據沈渭濱教授的看法：現在並沒有確切的資料說明陸皓東何時見到宋耀如，他認為很可能是1890年之後，因為自那年開始，宋耀如由「巡行傳道」改為「本處傳道」，在上海城市租界裏定居下來，他當時住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橋（今虹口東余杭路）一帶岳父倪蘊山的家裏，期間他執教於位於西藏路的監理公會著名的慕爾堂，這座教堂建於1887年，以後監理公會在八仙橋的「聖三一堂」也併入

37 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香港：三聯書店，2011），頁52-53。

38 勒法吉 (Thomas la Fargue) 著，高宗魯譯，《中國幼童留美史》（廣東：珠海出版社，2006），頁165。

39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187。

該堂。⁴⁰陸皓東既是新教信徒，慕爾堂又在上海電報總局附近，他要做禮拜，很可能就在慕爾堂。那麼，與執教於該堂主日學校的宋耀如相遇相識，並非沒有可能。這雖是推測，但合乎情理。據沈渭濱教授認定：宋耀如與陸皓東的相識與交往，「比較肯定的是在1890年宋嘉樹〔宋耀如〕在上海定居以後，到1892年陸皓東偕宋嘉樹南下和孫中山接觸以前」。⁴¹

可以推測的另一個事實，就是在陸皓東和宋耀如的交往中，陸必定向宋提到了童年時的好友革命領袖孫中山，這可能是引發1892年宋耀如與陸皓東共同南下，並初次與孫中山相見的契機（地點很可能在香港）。⁴²有關陸皓東在上海的行蹤現在並無史料可以供詳細查詢，雖然他那並不可靠的自供自稱「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⁴³，但事實似乎沒有那麼簡單，也不能僅僅歸之於他早年對於科學的興趣。一個較為可能的解釋是：他很可能想利用電報這種在當時較為先進的通訊手段進行革命工作。有跡象表明，陸皓東很早即有革命的願望和志向，早在少年時代，「任何形式的起義都是帝象（孫中山）和陸皓東現在最留心的事情，他們討論了失敗了的太平天國起義」。⁴⁴據羅家倫所編《國父年譜》，很早的時候開始，陸皓東即與孫中山一樣，敬佩美國華盛頓的民主與共和理想，他曾與孫中山討論「拿破崙，華盛頓史跡」，⁴⁵另一個解釋也同樣地與革命有關，那有可能他在上海為革命事業籌措經費。據後來1895年廣州起義的情況來看，革命者與會堂籌措的槍枝彈藥為數不少，⁴⁶這都需要金錢的準備。陸皓東在上海籌措經費的來源，既有可能來自於一些與他熟悉的廣東買辦（後詳），也可能與宋耀如有關。宋耀如是一名具有經商頭腦的基督教傳道人，曾經因資助革命事業而債台高築，但他很快以經商的方式擺脫了貧困。據上海監理公會老教友的口傳歷史：宋耀如開設的「華美書館」，印行聖經以及傳道單張，所用的是與外國人印刷業不同的

40 記該堂最初地點在上海雲南路，後遷至西藏路跑馬場附近。毛吟槎，《中華監理公會各堂紀年簡表》。

41 見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頁29。

42 同上。

43 語出陸皓東的供詞，鄒魯，〈乙未廣州之役〉，頁229。

44 陸燦，《我所認識的孫逸仙》，頁12。

45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頁34。

46 孫中山後來自言廣州之役被清廷收穫手槍600餘支。

價格低廉的中國土紙，降低了成本，發行情很大，由此賺了不少錢。⁴⁷他堅持傳教和經商必須兼顧，連牛尚周、溫秉忠也同意和支持他的想法，在1893年1月至2月，他從美國購買了麵粉機，所產質優價廉的麵粉供應上海租界內的麵包房和糧店，獲利頗豐。⁴⁸在此意義上，宋耀如似乎可被稱為「具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近代中國最早的基督教牧者之一。眾所周知，宋耀如對革命事業的資助不遺餘力，他的一部分金錢有可能經由陸皓東之手轉給南方的革命黨人。

陸皓東在上海期間，除與作為基督教傳道人的宋耀如、留美歸國學生牛尚周和溫秉忠諸輩交往以外，還與買辦階層有過接觸。據羅家倫等主編的《國父年譜》曰：1890年，

陸皓東為上海電報局任職，為旅滬同鄉鄭觀應（一作官應，字陶齋，1842-1923）所器重。是年陸皓東請假回鄉結婚，觀應則往廣州治病，……（孫中山）先生或因陸皓東介紹得識鄭觀應，由觀應將其懷抱改革的意願轉呈鄭藻如，孫中山向鄭藻如面陳改革計畫的可能性也很大。⁴⁹

文中提到陸皓東回鄉結婚一事，是指陸皓東奉母親王金悅之命，娶同縣莆山村歸僑、清朝稟生黎吉興之長女黎竹青為妻。⁵⁰從《國父年譜》這段記錄可以看到：（一）陸皓東、孫中山與鄭觀應為有同鄉之誼，陸在上海電報局任職時，與鄭觀應有往來：上文所述，陸皓東的父親陸曉帆，長期在滬經商，經營南北雜貨以及出賣自己的書畫，還兼營貨倉，他的店鋪名北泰行，又名九百行；很可能他的家族早已與廣東在上海的商幫有聯絡和往來；⁵¹（二）根據羅家倫和吳相湘的看法，孫中山很可能是由陸皓東介紹給鄭觀應，並由鄭觀應介紹面見或致信給另一位同鄉的鄉紳鄭藻如。鄭藻如為廣東香山縣濠頭村人，字玉軒。他是咸豐元年舉人，受知於李鴻章；1881年（光緒七年）以候補三品京堂出使美國、西班牙、祕魯三國大臣，他曾代表清朝處理美國排華風潮，是當時少數了解

47 2011年9月18日下午筆者訪問景林堂余江牧師的記錄。

48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225。

49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邦儀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53-55；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台灣：遠東圖書公司印行，1982），頁75-76、78。

50 陸錦燕、黃季力，〈第一位為共和英勇獻身的烈士陸皓東〉，《文史初探》第4期（1995）。

51 陸皓東13歲時因父喪，與母親和妹妹一同扶其父之靈柩回籍。

世界事務的官員，1884年（光緒十年）授通政司副使，次年遷光祿寺卿，1886年因半身不遂，離任回廣東原籍休養。⁵²（三）孫中山在這年致鄭觀應的信中指出：（1）重農桑、禁鴉片；（2）光文教，攬人才（有「遠觀歷代，橫覽九州，人才之興衰，風俗之浮靡，實關教化」之句），他主張將其改革計畫先實驗於香山，後推行於全國。⁵³孫中山的這些主張與後來的〈上李鴻章書〉非常相似。（四）最重要的是孫中山因陸皓東的介紹認識鄭觀應，同為香山人的鄭觀應出身於中下層的家庭，他的父親原來是一名村塾教師，他的哥哥鄭濟東先在寶順洋行當買辦，後又到旗昌洋行當買辦。⁵⁴1859年，17歲的鄭觀應因科舉考試名落孫山，他放棄傳統的教育去上海做生意，他向叔叔，當時上海著名的買辦鄭秀山學習英語，又向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939-1928）學習英語；1860-1867年先服務於英商寶順洋行，在另一位同鄉、著名的買辦徐潤及其叔叔徐鈺指導下管理貨運和貨棧；1873年至1881年又成為太古洋行下設的太古輪船公司當買辦。⁵⁵從1886年至1893年間，鄭觀應開始醞釀並且撰寫其名著《盛世危言》，期間從1885年至1892年正是陸皓東旅居上海期間，1890年則是陸皓東回鄉結婚、鄭觀應回廣州治病及因陸的介紹認識孫中山的年份。郝延平先生將《盛世危言》與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的內容相比，指出：「孫中山1894年在上海草擬的〈上李鴻章書〉的主要思想、甚至文句格式，都使人聯想起『碩學買辦』鄭觀應的思想和文采，孫中山與他曾有交往。」又說：

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前言中斷言，西方在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優於中國，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和「物暢其流」；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指出了四種情況，前兩個同鄭觀應一樣，第三個是「物盡其用」，第四個是「貨暢其流」。⁵⁶

52 劉秉榮：《辛亥革命秘史》上（北京：羣眾出版社，1994），頁27。

53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訂，《國父全集》初編（台北，1985年6月），頁277-279。

54 有關鄭觀應的研究，見夏東元，《鄭觀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等等。

55 「鄭觀應在寶順洋行的十年間，除做買辦份內的事以外，自己也做一些生意。離開寶順洋行以後，鄭觀應的投資和經營活動仍然在茶葉、輪船業和販鹽業等領域」。據胡波，〈買辦與社會轉型——以香山買辦為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合編，《買辦與近代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101。

56 郝延平著，沈祖堯、杜恂誠譯，《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間的橋樑》（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38-239。

陸皓東、孫中山與鄭觀應之間交往的行跡，可以看到當時在廣東、香港、澳門與上海之間的革命者、留學生以及買辦交往的背景。

1894年2月，孫中山先是在家鄉隱居了一段時間，專門寫作〈上李鴻章書〉，以後，他又到廣州，看到幫助他維持藥店業務的陳少白，給他看上書的內容，徵詢他的意見，不久，又偕同陸皓東赴上海。⁵⁷「這份上書同陳少白商量，與陸皓東一同投遞。事件並非個人之行動，反映了與孫中山志趣相投的人的共同願望」。⁵⁸6月，他偕陸皓東前往天津，上書李鴻章，呈陳改革的方案，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綱。

關於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管道，有過不同的說法，一說他在上海鄭觀應家結識了王韜：

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即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為《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下對於世界知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鄭觀應）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⁵⁹

二說孫中山

自粵赴滬以前，曾由澳門海防同知魏恒致函盛宣懷之堂弟盛宙懷，請轉宣懷向李鴻章推薦。先生至滬見盛宙懷時在天津籌辦東征轉運事宜，魏恒、盛宙懷、鄭觀應三函宣懷均曾親閱，並在信封手批時日及「孫醫士事」，且曾致函李鴻章，介紹先生往見。⁶⁰

57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外一種》見之於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132-133。

58 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0），頁56。

59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133。

60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66-67；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93-95。

沈渭濱教授早在1980年即從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的文書檔案中，找到三封書信以資佐證，分別為魏恒、盛宙懷以及鄭觀應為孫中山所寫的信，⁶¹並由戈止義教授訂正。⁶²新近由黃宇和教授所寫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一書中，對孫中山邀請陸皓東一起陪他去上海的動機也作出了合理的分析，他說：

孫中山拿了魏恒的信，就起程前往上海，並與陸皓東結伴而行。為甚麼去上海？因為當時盛宙懷在上海。為甚麼邀陸皓東同行？因為陸皓東是上海電報局的領班生，熟悉上海的情況，而他任職的上海電報局之總辦又正是盛宣懷，孫中山希望陸皓東能設法打通那條請盛宣懷介紹見李鴻章的途徑。⁶³

盛宙懷鑒於魏恒的情面而接見了孫中山，在他致堂兄盛宣懷的信中提及「頃有滬堂教習唐心存兄之同窗孫逸仙兄」之句，上海圖書館葛正慧先生考證此人可能是唐元湛，亦為廣東香山人，1862年生，長孫中山四歲，「所謂同窗者，可能是故鄉私塾先後校友含糊之詞。至於『滬堂』，可能是電報學堂上海分班之簡稱，是盛宣懷所開辦，故不必全稱」。⁶⁴

孫中山與陸皓東於1894年2月間來上海，6月至天津上書李鴻章。在2月至6月間，他們很可能一直在上海活動，一方面與盛宙懷見面，另一方面，很可能（或者說是一定會）與宋耀如見面。沈渭濱教授據孫中山於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曉生的信中所談到的「宋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之句，認為「所謂『二十年前』是一個明確的時間限定語，不是一個模糊的約數。在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明其他時間的情況之下，不應作為約數來讀」。因此，他推定孫、陸、宋三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892年。⁶⁵如果這種判斷成立的話，那麼1894年他們就是第二度會面。據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傳》稱，他們是在「陽春三月」見面的，而且不止一次，相與見面還

61 沈渭濱，〈1894年孫中山謁見李鴻章一事的新資料〉，《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88-94。

62 戈止義，〈對《1894年孫中山謁見李鴻章一事的新資料》之補正〉，上海《學術月刊》第8期（1982），頁20-22。

63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頁525。

64 同上。

65 《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24。見沈渭濱，〈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頁27、29。

有牛尚周和溫秉忠諸人。⁶⁶孫中山向他們告知了此行北上的目的，但宋耀如不以為然，宋認為中國的情況不能夠靠改良和上書去解決，而應訴諸革命。他的觀點顯然比孫中山更為激進，他雖然沒有阻攔孫中山北上，但明確地告訴孫中山「中國需要的是華盛頓、林肯」。⁶⁷由於該書是一部基於歷史事實的傳記文學，後人無法知道這些話的來歷和確切性。

不過，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分析，以及孫中山本人後來的表述，在當時宋耀如比孫中山更為激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就兩人在美國所受的教育背景來看，宋比孫年長五歲，從1876年去美國，1886年1月回到上海，十年之間，他「用生命，用血淚去學習西方事務，然後用奮鬥，用笑容去傳播這些新知，他嚮往美國的立國精神，追尋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當他把美國內戰前的情勢和中國當時的現況進行比較，卻發現歷史悠久的祖國完全處於不民主、不自由的半奴隸社會」。⁶⁸考察孫中山的行跡，他的一生先後六次去檀香山，四次去美國本土，但在1894年以前，他沒有到過美國本土。在1894年以前，宋耀如對美國政治觀念理解的核心已經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總統在格的斯堡演說中所表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孫中山在檀香山時知道華盛頓和林肯，但有關「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尚沒有成為他的核心觀念，以至於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以後逐漸形成的三民主義部分地歸之於受到宋耀如的影響。⁶⁹

（二）在上述致友人李曉生的信中，孫中山稱宋耀如談革命「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一世』」，又說「彼從事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⁷⁰宋耀如本人在讀了意大利燒炭黨人的傳記以後曾對倪桂珍和陸皓東說：「我是上帝的牧羊人，但從今天起，我同時要做一個隱身的燒炭黨人。」⁷¹有關孫中山自幼在鄉間聽太平天國老兵講洪楊軼事、矢志革命之說，曾經廣為流傳，筆者亦以後來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一事似與此說自相矛盾為惑。最近讀黃宇和先生《三十歲前的

66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

67 同上。

68 陳立文，〈宋耀如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新東方》創刊號（1992年1月），頁5-6。

69 鄭朝波，〈宋耀如美國觀對孫中山的影響〉，《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4期（2009），頁38-39。

70 《孫中山全集》第2卷，頁324。

71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頁197。

孫中山》一書，作者對孫中山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13至26歲）在夏威夷的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School）、奧阿厚書院預備學校（Oahu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以及香港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所受的教育作了全面的考察。作者深入研究了這些學校的制度、課程、宗教生活和學習生活，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學校均為英式而非美式的教育。這些學校中所傳播的法治觀念對他影響深遠，以及他醫科畢業以後在澳門和廣州行醫時進一步目睹滿清官吏的那種無法無天，嚴刑拷打嫌疑犯所造成的人間悲劇，皆加強了他改變當時制度的決心。改變制度，既可以從外面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也可以從裏面用改良的方法把它從根本上改變……孫中山的思想歷程經過了改良、革命、改良、革命多次轉折，最後還是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⁷²與宋耀如相比，孫中山所受的教育（英式而非美式）和思想發展歷程更為複雜和多變。⁷³

（三）孫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指出：

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激憤。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萌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萌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辦甚周，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收穫手槍六百餘杆，事機乃泄，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有史以來中國為共和革命犧牲之第一人也。⁷⁴

72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534。

73 與宋耀如相比，孫中山所接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可能更多。在孫中山〈致翟理斯函〉中，他曾自言：「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孫中山全集》第1卷，頁47）。羅香林先生採訪孫中山的姐姐孫妙茜老姑太，可知孫中山入村塾時即讀《三字經》、《千字文》，「瞬即背誦無訛」，以至村塾老師不久即授以四書五經。參羅香林，《國父家世源流考》（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39-41。後來孫中山在總結三民主義時，曾將四書中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太平天下」的古代理念，從中土擴展到全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三民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一），頁53-54），都證明了他的思想受到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

74 孫中山，〈革命原起〉，柴德庚、榮孟源等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4-5。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到，是宋耀如最初在清朝甲午戰敗以後致信孫中山要他緊急回國發動革命，且孫中山將宋耀如與鄧萌南、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等並稱為「同志」，可以想見宋無論在思想、組織和資金上都深深介入到革命事業當中。

三

吾師陳旭麓教授在其名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中指出，近代中國在西力東漸的衝擊下，社會發生急劇的轉變，產生了兩種新的社會羣類，那就是「買辦階層和教民」，它們是在傳統的「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階層之外的異類：

鴉片戰爭以後，外人來華漸多，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師，他們的活動，不僅帶來商品、教義，而且猶如實行嫁接，在中國社會體內，因此長出了從未有過，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這就是買辦階級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傳統的士農工商之外，好像出現了第五種職業階層。這部分人在近代中國曾發生過非常特殊的作用。作為一個階級和階層，他們是依附於外國勢力的人，兩者都與西洋人結緣，世人嗤之以鼻誠為事出有因。但是，一種結果又會引出另一種結果，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最早代表和近代企業的著名創辦者，不少出自買辦當中，而教民中則有孫中山這樣的人物。

又說：辛亥革命是「中等社會」的革命。⁷⁵從宋耀如、陸皓東、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溫秉忠、牛尚周、鄭觀應、盛宙懷的歷史關係當中，正可以窺見基督徒、牧師、留學生和買辦之間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他們作為一個羣體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的意義。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歷史軌跡：

其一，推動早期近代中國改革和革命事業的人士大都是南方沿海通商口岸的人士，正是這些地方與外洋發生了最早的接觸和聯繫，由此產生的社會嬗變也從這些地方開始。以宋耀如的家鄉廣東文昌縣來說，據《馮宮保軍牘集要》所載，光緒十二年（1886），馮子材於瓊州黎平時奏

75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文提及「文昌縣人稠田少，每年出洋趁工服賈者甚多」，⁷⁶《文昌縣志》如載：從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間，僅通過客運出洋的瓊州人就這24.47萬人之眾，平均每年一萬餘人，他們都是青壯年的勞力，多從青瀾、鋪前乘三桅船於冬至前後啟程，趁北風漂流到東南亞或再轉程到歐美各地。⁷⁷至於陸皓東、孫中山的故鄉廣東香山縣，更是近代中國改革和革命的搖籃，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之父容闈以及後來出洋的許多留美幼童均來自廣東香山或周邊地區，眾多的買辦如鄭觀應、徐潤、唐廷樞的故里也在這個地方，他們都在後來中國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林百克所著《孫逸仙傳記》曰：

廣東人活潑的天性使中山有一種強毅的精神和敏捷的體魄，這種特長在他環遊海外做推翻滿清事業的時期中安置他在優越的地位。

……

廣東人天性聰慧、善於交際，他們熱帶上的人，體格總不能像北方人一樣強壯，但是他們活潑靈便的體格無論幹甚麼勞苦的工作，都能彌補這種缺點。

……

廣東人是勇敢、自持、耐苦的種族，他們雖然離本國的中心和北方很遠，但很忠愛國家。……翠亨也能分潤些廣東全省所有的好處。中山在他努力建設中華民國的三十年工作中，廣東人給了他不少幫助，因為他是他們的同鄉，所以在海外的廣東僑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替他盡過力的。⁷⁸

另外，由於廣東地處邊陲，常常是清朝中央政府的轄治不逮之地，所以居住在廣東邊緣尤其是近海地方的一般民眾，養成了一種自由的習性。孫中山曾對林百克說：

直到我十三歲離開中國到火奴魯魯的時候，我記得沒有聽見北京是皇帝權力的中心，不過知道翠亨村是與香山有關的。香山是我們翠亨的縣城，在他的周圍，那許多村的人們溫和無變地生活。在

76 張卿雲、莊秉衡編，《馮宮保軍牘集要》卷十一（北京：中國書店，1994）。

77 文昌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文昌市志》十七編（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頁491。

78 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頁18、19、33。

政治和社會的行動很是整齊，好像永久依着軌道一樣。因為翠亨和周圍別的村子，都以為凡與法律秩序有關的事情，香山是權力最後的地方。所以他們認為北京是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的。⁷⁹

這種在自由和無拘束的環境中生長養成的不羈性格，正是以後推動改革和革命的起點。正是因為南方以及沿海在中國近代的改革和革命事業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費正清（J. K. Fairbank）所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在其導論中一開始就講「中國歷史上沿海與內陸」的關係：

通商口岸的發展為中國帶來新的交通和工業技術、新的有關外族的知識，同時也促進了一種民族主義精神。郭實臘和裨治文的開拓性的地理學研究引出了魏源和徐繼畲19世紀40年代的地理學作品。數十年以後，更出現了江南製造總局和基督教與一般知識傳播社（SDK）的翻譯工作。類似王韜這樣的基督教改革家和報人在外來影響之下出現於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他們開始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孫逸仙出生於最早的對外港口澳門附近，並且在檀香山和香港完成了學業。雖然他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宣傳家，但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渡過的。這可以表明，中國的西化論者一般都是沿海人。⁸⁰

其二，在當時的通商口岸香港、澳門和上海之間，出生於廣東（尤其是香山）的基督徒、留學生買辦，和西方傳教士之間有一種複雜的關係，這可以從陸皓東、宋耀如和孫中山之間社會關係網絡中找出一點端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成為他們頻繁活動的重要地點。陸皓東出生於上海，1878年父喪以後扶其父靈柩回到家，1885年至1892年間又在上海住了七年（其間曾回鄉結婚）；在陸皓東短短28年生命中，他在上海居住的時間約有17年之久。宋耀如於1886年作為監理公會傳道人被派回上海以後，除短期離開上海去日本等地外，基本的活動也在上海；⁸¹對陸皓東甚為器重並與之交往、再由陸氏介紹給孫中山相識的出生於廣東香山的鄭觀應，從1859年開始，一直在上海從事經商和著述。⁸²

79 同上。

80 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導論：中國歷史上的沿海和內陸〉，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6-27。

81 「宋嘉樹」，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25。

82 熊月之，〈論近代同人鄭觀應〉，王遠明等主編，《被誤讀的羣體：香山買辦與近代中國》（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頁285-295。

另有兩位出生於廣東香山的買辦唐廷樞和徐潤，也在上海有過極為不凡的表現。唐廷樞（1832-1892）為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人，早年就讀於香港馬禮遜學校，19歲以後即在港英政府中任翻譯。1858年抵滬，先後任海關大寫、正大寫及總翻譯，1863年任怡和洋行買辦，1873年脫離怡和洋行參加上海輪船招商的改組，為當時中國最大官督商辦的上海輪船招商局的總辦。⁸³他在文化事業上亦有建樹，曾著有《英譯集全》傳世。⁸⁴

出生於香山縣北山村的徐潤（1938-1911）於1852年14歲時即到上海寶順洋行當學徒，1852年升為買辦間富帳房，1861年升為副買辦，兼營寶源各貨號的絲茶、煙葉以及鴉片，1868年脫離寶順洋行，自設寶源祥茶棧，1873年受李鴻章委派，任事於上海輪船招商局，當時唐廷樞為總辦，徐潤則為會辦，他與唐廷樞是終生的好朋友，並且在商業上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劉廣京先生〈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曰：「唐於同治年間並任上海絲業公所，養藥局，茶葉公所及各善會董事，並曾與徐潤叔姪等，合創廣肇公所，為旅滬粵商最重要的組織之一」。⁸⁵可見唐、徐兩人是旅滬廣東商人中的領袖羣倫的人物。

1892年唐廷樞在天津去世時，徐曾親往天津弔唁。⁸⁶徐潤編著有《徐愚齋自敘年譜》一書，由香山徐民校印，1927年出版，被收錄於由台灣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50輯，該書留下了當時的買辦與買辦、買辦與教會以及買辦與留學生及留學生運動的史料，同時也反映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經濟和文化事業蒸蒸日上，其地位迅速超過廣州的盛況。茲從下列幾個方面來看：

（一）咸豐二年（1852年），剛到上海的徐潤，他看到了小東門碼頭一帶南來北往的船隻，熙來攘往的繁榮景象，驚異不置。他這樣寫道：

83 有關唐廷樞的研究，可參見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6月號（1961）；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唐有滄，〈從買辦到民族資本家〉（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珠海香州區政協文史委員會聯合編印，1997）；1878年6月《上海遠東月報》（*The Far East*）上曾登唐景星（廷樞）簡傳；又見李世源，〈洋務運動中堅：香山三傑〉，澳門《文化雜誌》夏季刊（2009），頁47-52。

84 《英語集全》，廣州經緯堂，1862年版，現藏於珠海市博物館。

85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5。

86 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頁221-222。

亦昌號在鹹瓜街，當時為南北大道，咽喉之區，西則襟帶縣城小東門、大東門之所出處，東過兩街則為黃浦，故市場最為熱鬧，南則帆牆輻湊，常泊沙船數千號，行棧林立，人煙稠密，由水陸到者從黃浦陸行必從此街也。再北者有潮州會堂、天后廟、界外則是浦江。……⁸⁷

他復又記載了上海英美租界以及法租界擴界拓展的盛況，當時英美公共租界已經從外灘往西延伸至今西藏路人民廣場（即當時的跑馬場一帶），往北則至寶山縣界，換句話說，已經基本形成至1945年歸還國民政府時的宏大規模。徐潤這樣寫道：

跑馬場計地四百八十畝，蓋已三遷矣，每畝價值數十兩或百餘兩，今價值數千兩至數百兩不等。又復佔浦北地自跨有蘇州河，立為美租界；……美界已佔至寶山縣界，又復於泥城橋之西，老閘橋之北，佔為公共租界，一切佈置，均不亞於英租界，總而言之，英租界也，美租界也，皆英人獨掌其權，實三而一也。惟法人則各守疆界，橫覽十里洋場，以冥冥荒塚之地，竟成繁華富庶之鄉，其經濟之窮，力量之大，豈不偉歟！⁸⁸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租界是全國市政的模範」，⁸⁹徐潤的記敘是1852年，陸皓東則出生於1867年的上海，期間相隔15年之久，當時陸皓東看見的上海租界的場景，比徐潤的記敘更為繁華，應該不會對少年的陸皓東以及後來到上海的孫中山產生影響。

（二）在《徐愚齋自敘年譜》中還透露了買辦與留學生及留學生運動的關係。容閔（1828-1912）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1854年）的中國人，回國以後報國無門，於1859年曾經做過上海寶順洋行在江西採購茶葉的代理人。⁹⁰因他與徐潤是同鄉，所以徐潤曾與他合夥在上海做生意。《徐愚齋自敘年譜》記曰：「榮村公來申擬做生意賣茶葉，番寄四

87 徐潤，《徐愚齋先生自敘年譜》，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50輯（台灣：文海出版社影印），頁5、6-7。

88 同上。

89 袁燮銘，《工商局與上海早期路政》，氏著，《上海：中西交匯裏的歷史變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90 容閔自記在上海「脫離海關以，我再次找到的職業是在一個經營絲茶生意的英商那裏做職員。在我和他們相處的幾個月中，我充分了解了貿易行業以及做生意的方法，這些後來都成為對我非常有益的知識和經驗，我在這裏工作了六個月。……」容閔、王蓁譯，《西學東漸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38。

千餘件後開通源雜糧土號，資本二萬五千兩。榮村公五千，潘爵臣、容純甫、李量之並餘名下各五千，……」⁹¹文中所指的榮村為徐潤的叔叔，容純甫即為容闈。徐潤後來還直接地介入了由容闈發起，得到當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支持的近代中國第一次派遣留學生出洋的活動。在《徐愚齋自敘年譜》中直接記錄了在1873年曾國藩正是委託徐潤幫助實現這一計畫。在該書「同治十年辛未四十三歲」條下記曰：「冬十月奉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劄委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秋容純甫帶領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經費由海關撥給。」⁹²可見當時徐潤負責的是挑選幼童的工作。在他所寫的第一批名單中，即有後來與宋耀如、陸皓東和孫中山有密切關係的「牛尚周」，名單上他的籍貫是「江蘇嘉定，年十一歲壬戌」；還有「溫秉忠」，籍貫是「廣東新寧縣，年十二歲壬戌」，又寫有「父清溪，天津習機器」之語。⁹³在第一批留美幼童當中，出身於廣東香山縣以及周圍地區的人亦復不少，是否可能與徐潤的選擇有關呢？

（三）《徐愚齋自敘年譜》中記載了廣東的買辦與上海基督教會之間的關係。書中不僅有記「中虹橋傍有三家傳耶教房屋，橋邊有一禮拜堂」之類有關教會和教堂的記錄，還在「同治七年」條下，記錄了譜主本人與另一位香山買辦唐廷樞出任多家教會醫院及機構董事的情況：「上海醫院以山東路仁濟醫院開設最早，設有中外董事，唐景翁與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輔元堂、清節堂、仁濟、元濟堂、格致書院，唐與余亦為董事。」⁹⁴仁濟醫院由最初到上海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等建於靠近外灘的山東路，時間在1844年。⁹⁵王韜的墨海書館也在附近，⁹⁶與開埠初年英國工部局（九江路）以及聖三一堂的位置也十分接近，至於著名的格致書院，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建於1874年，它的地址

91 徐潤，《徐愚齋先生自敘年譜》，頁31。

92 同上。

93 同上，頁27-28。

94 同上，頁28。以唐廷樞、徐潤共同任職的格致書院董事會為例，中國籍董事在其中有一定的發言權，「無論是教習聘用、課程安排，都由中外董事共同商定」。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281頁。

95 仁濟醫院最初設在城南外一間民房，後遷至今天的地址。

96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145。

亦位於山東路至西藏路的跑馬場和慕爾堂之間，⁹⁷所有這些地方都在方圓一公里之內，可步行抵達。當時在這片英租界的區域之內，布滿了外國的洋行、海關、領事館、教堂、教會醫院和學校。穿梭於其間的中國人多有教徒、教士、留學生與買辦。據郝延平先生的研究，與徐潤同任這些機構董事的唐廷樞從1842至1873年的31年（即10歲至41歲）間，其家族和他本人與教會學校、殖民政府、外人掌管的海關和洋行有着密切和長期的交往。⁹⁸而他自稱本人早期在香港所受的教會教育為「徹底的英華教育」。⁹⁹而鄭觀應本人則是傳教士所辦的《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受到西方進步思想的巨大吸引，以致他有一回竟買下了一百份羅伯特·麥肯齊（Robert Mackenzie）的《十九世紀史》（《泰西新史攬要》的漢譯本，分送給他北京的朋友們。）」¹⁰⁰眾所周知，雖然1894年6月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失敗，但他還是將全文八千餘字的上書以〈上李傅相書〉為題發表於上海的傳教士所辦，亦為鄭觀應熱衷閱讀的《萬國公報》第69至70期（1894年）兩冊上連載。

另據徐潤年譜以外的史料，唐廷樞和徐潤還與監理公會傳教士林樂知的活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黃素士據監理公會年會紀錄所撰的《監理公會重要西宣教傳略，長老林樂知傳》曰：

是年（1881）冬，（林）在上海八仙橋東首購地建造中西學堂第一分院，即前之三一堂是也。先生與劉樂義君同任英文教習。次年又在虹口昆山路建造第二分院，旋以第一分院並歸斯校，改稱中西書院。至一八八六年十一月正式派先生為中西書院監院，於是專任教育以及譯書撰報工作。待佈道會海淑德女士來華以後，經先生之協助，又在西藏路漢口路轉角建築中西女塾。¹⁰¹

97 格致書院具體的地點位於上海英租界內福州路北首（今上海格致中學）。在1873年3月24日成立的格致書院董事會有麥都思之子麥華陀，也有唐廷樞，後者還是主要籌款人。在捐款人中有唐廷樞和徐潤的名字。〈格致書院創辦經費人統計表〉，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278-282。

98 郝延平，〈由守舊到革新〉，《大陸雜誌》4月號（1960），頁26-27。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頁243-244。

99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唐自1842年至1848年入讀香港馬禮遜學校（The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 School），繼進英國教會學堂。頁143。

100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頁245。鄭觀應早在寶順洋行時，「公暇之餘，約高要梁君綸腳入英博士傅蘭雅先生英華書館夜課，唯讀英文兩年，可知當日貧讀之難」。（《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

101 黃素士，〈監理公會重要西宣教士傳略，長老林樂知傳〉，《中華監理公會年議會五十周年紀念刊》頁51。

另據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載：成立於1881年的中西學院共有三處地址：第一分院位於八仙橋畔林樂知住宅對面，（即上文提及之三一堂）；第二分院則位於上海吳淞路，佔地一畝五分；還有一個大書院，位於吳淞路，昆山路交界處，佔地35畝，原為徐潤的產業，兩個分院先建，大書院後建。按1883年捐款清單中，紳商中買辦及買辦出身的人最多，有唐廷樞、鄭觀應、席正甫、朱寶珊諸人。¹⁰²從這項紀錄來看，唐廷樞、徐潤與鄭觀應應該都與林樂知有交往，至少應是互相與聞的。至於徐潤的產業如何成為林樂知的中西學院學址，值得再考。據稱書院在1905年遷入蘇州東吳大學以後，其原址成為東吳大學的法學院。至於黃素士文章所提及的在西藏路、漢口路轉角所辦的中西女塾，即為後來遷往愛文義路的中西女中，即為宋氏三姐妹的母校，監理公會早期來華的年輕女傳教士海淑德即為第一任校長。

（四）《徐愚齋自敘年譜》中還零零星星記錄了一些有關1860年代中期至末期上海經濟生活的變化，以及洋行買辦勢力增長的趨向。如該書所記：「同治五六年（即1867年至1868年以後），寶順洋行獲得利頗難，因南北花旗開仗以後各埠生意頗清，東洋、北洋、上海、福州各埠又復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達，無可收拾。……」文中有「上海」等各埠「洋行林立」之句，按上海由於其國際貿易地位的重要，僅開埠以後第一年，即有英美洋行11家。¹⁰³到1852年據當時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彙編，已有洋行41家，大部分為英國、美國和來自印度拜火教徒（他們是大英新聞社國統治下印度人中最西化的本地商人）所開設。¹⁰⁴開始時大的洋行都雇用廣東人做買辦，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和寶順洋行（*Dent, Beale & Co*），他們主要從事茶葉的貿易，但在1860年代中葉以後他們的地位受到浙江（尤其是寧波）的買辦挑戰。這種趨勢發展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雖然在香港廣東人仍然是買辦的主體，但在上海，浙江的買辦已經超過了廣東的買辦。¹⁰⁵據郝延平先生的研究，在1870年的時候，當時中國有550家外國洋行，上海有203家，香港為202

102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491。

103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頁331。

104 陳文瑜根據1852年《北華捷報》彙編，氏著，〈上海開埠初期的洋行〉，《經濟學術資料》第1期（1983）。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1843-1894），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50-79。

105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頁63-64、125。

家。¹⁰⁶可見，與外國洋行的經濟聯繫方面，當時的上海並不亞於香港。

誠如費正清所指出的：由外國人帶來的航海和發展經濟的次要傳統，「幫助了通商口岸混合社會的形成，養育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早期中國社會，鼓勵了個人主義精神和對科學技術的興趣，同時，它也喚起了愛國主義和文化自尊心」。¹⁰⁷這個「混合社會」，就是最初與外洋事物發生接觸的近代中國人——買辦、基督徒、留學生和早期的維新家和革命者構成的。當然，他們往往由一個人身兼數重身分，如宋耀如則既是基督教的牧者，又是隱祕的革命家；孫中山既是留學生，又是革命者；鄭觀應則為買辦和改革者，陸皓東自幼生長在通商口岸上海和南方，他一直在上海、香港、廣州之間往來穿梭，所接觸的對象並不外於上述的幾種羣類。其中買辦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羣體，他們是商人，但卻涉足於近代中國的改革甚至革命，這不能不說這與他們自童年時代所受的教育迥然不同於由傳統士紳出身的緣故。郝延平先生指出：與傳統的儒家紳士相比，「買辦似乎不太在意儒家教義，因為他們力量的上升恰恰是基於對正統儒教的背離，而同夷務，更重要的是同財富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知道，精通儒學對於他們沒有更大的用處，他們感興趣的正是商業和工業的發展」。¹⁰⁸郝延平則統計參加辛亥革命的買辦有何寬、楊衢雲、謝纘泰、劉祥、楊心如等，興中會的第一批買辦成員有何寬、鄭曉初、黃焯文、黎炳垣、劉祥、陸燦、溫芬、溫遇貴等等。¹⁰⁹

在這個「混合社會」中的第二種羣類即為基督徒和留學生。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兩種身分往往兼而有之。¹¹⁰按孫中山與陸皓東均為基督徒。《國父年譜》載：1883年冬天，陸皓東與孫中山一同受洗於基督教網紀慎會（公理會）。

106 同上。

107 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頁27。

108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買辦》，頁233。

109 郝延平指出有關買辦和孫中山革命運動的關係，可以參考：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3卷，頁1、62；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7-8、23-32；馮自由，《革命逸史》（重慶、上海：1939、1947年版），頁1-2、31-122。

110 其實在那個時代身兼基督徒、留學生和買辦三種身分的早期革命者亦復不少，黃宇和先生考「輔仁文社」社友10人，其中7人是中央書院畢業生，2人是聖保羅書院畢業生，1人是聖若瑟書院畢業生。他們畢業後在政府機關任事，或當洋行買辦，或留校教書。他們沒有被英國殖民地教育奴化，反而非常關心國家的前途。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545。

先生肄業於香港拔萃書院以後，課餘常隨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長老區鳳墀習國學，又結識美國網紀慎美部會（American Congregation Mission）美籍牧師喜嘉理（Rev. Charles B. Hager, 1850-1917），在他的勸化之下，孫中山與陸皓東同受洗於禮拜堂，由喜嘉理牧師親為之施洗，孫中山署名「孫日新」；陸皓東則署名「陸中桂」。¹¹¹

不過，最近根據黃宇和先生的研究，孫中山受洗的日子是1884年5月4日星期天，他是在同年4月15日在香港中央書院註冊入學以後做出受洗入教的決定。喜嘉理牧師有封親筆信都說他只是為一個人施洗，所以黃宇和先生認為孫中山沒有與陸皓東同時領洗，但香港公理堂受洗人名單又明明載有「陸中桂」的名字，並指明他來自香山翠亨。黃先生認為「陸中桂」的名字是後業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添加上去的。¹¹²但黃先生指出：喜嘉理牧師在1884年10月19日聆聽了一個人表達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又說此人是他自己的教堂中的一位教友介紹而來的，而這位教友是在香港讀書的學生。黃宇和先生認為介紹人就是孫中山，而被介紹人很可能是陸皓東。至於陸皓東添列於受洗者名單則很可能是孫中山在革命勝利以後追念陸氏而請喜嘉理牧師追加了的。¹¹³黃先生指出：「重建了陸皓東『領洗』的具體情況，不但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孫中山與陸皓東的交情，也有助於了解孫中山在1884年那個時代對宗教的熱情。因為正是由於他對陸皓東宣揚了基督教的教義，陸皓東才趨向喜嘉理牧師表達他對於基督教的信仰。」¹¹⁴事實上，陸皓東是否受洗無損於他對於基督教熱忱。有跡象表明，從很早的時候開始，陸皓東就已經對基督教十分投入，據當時又還年少的陸天祥回憶：「孫中山讀大學時，這裏也有幾個傳教士，是從澳門來的，沿途傳教、派福音書，到翠亨祠堂門口等着宣傳。有一次陸皓東招呼他們在家過夜。」¹¹⁵有跡象表明，陸皓東可能將基督教和革命事業聯繫在一起考慮。陸燦所寫的《我所認識的孫逸仙》提及：

111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頁34-35。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0-12。

112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330-335。

113 同上。

114 同上，頁335。

115 黃建敏，《翠亨村》，頁121。

任何形式的起義都是帝象(孫中山)和陸皓東現在最留意的事情，他們討論了失敗了的太平天國起義，這場起義1846年由洪秀全發動，最初是基督教運動，但後來演變成爲有組織的反清鬥爭。他們注意到，起義是從破壞舊偶像開始的。¹¹⁶

由於陸皓東並沒有去過國外，逗留在香港的時間也不長(這是喜嘉理牧師無法對他加以考察故未曾施洗的原因)，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興趣一則是受孫中山的薰染，二則則是從基督教與洪楊太平天國的聯繫而萌發的、並想深入探究的。雖然孫中山後來與教會的關係，漸行漸遠，¹¹⁷但正如黃宇和先生所言：縱觀他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至1925年3月12日去世為止，他的行跡「酷似歷史上偉大的傳教士中人的事蹟」，「孫中山立志奉獻的精神從來沒有改變，只是奉獻的目標從救靈魂必為救肉體(即救國救民)而已」。「孫中山處於國難深重的時刻，覺得救國救民比救靈魂更緊急。救靈魂，就讓外國傳教士去做吧。救中國，既不是外國傳教士的責任，也不是外國傳教士的願望。救中國的責任，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去承擔。從這意義上說，孫中山覺得救國救民是責無旁貸！」¹¹⁸

從孫中山的行為可以推測他的好友陸皓東。縱觀陸皓東年輕的一生，在奉獻救世以及革命事業上的狂熱，一如孫中山；據陸燦所言：「陸皓東狂熱地為革命事業付出，甚至變賣年輕的妻子的首飾去資助革命活動。我有一個姑媽住在廣州，她在來信中談到陸皓東的情況，讓村裏人心惶惶。」¹¹⁹「他父親死後留下來的財產頗豐，他毫不吝嗇地提取出來作為運動的經費。」¹²⁰陸皓東在乙未廣州之役被捕以後的英勇表現，更使人想起耶穌為救世人而被釘十字架的殉道精神；孫中山在香港得知陸皓東被捕的消息以後，為營救他不懈努力。他聯繫了美國領事為他出面求情。還找到了陸皓東工作的電報公司，向清朝地方官吏保證陸皓東只是他們所雇用的一個學生，不會真的參加造反活動。「但所有的朋友都沒有充分估計到這個青年人的革命熱忱。美國領事去了衙門，發現陸皓東已

116 陸燦，《我所認識的孫逸仙》，頁12。

117 馮自由：「余在日本與美洲與總理相處多年，見其除假座基督教堂演講革命以外，足跡從未履禮拜堂一步」，〈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革命逸史》第2冊，頁12；張永福，〈孫先生起居注〉，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先生生平追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822。

118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165-169。

119 陸燦，《我所認識的孫逸仙》，頁19。

120 何伯言編著，《陸皓東、史堅如》，頁27。

經寫了供詞。他向他的朋友解釋說：他希望自己是革命事業的第一個獻身者，他還說清政府可以殺他一個，但殺不盡數以百萬計的後繼的革命者」。¹²¹

在廣州起義前一年即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入會時採用宣誓結盟的方式是：各人在開卷聖經上置其左手，右手向上高舉，懇求上帝鑒察，然後宣讀誓詞，其「方式不採中國傳統歃血為盟，而採用基督教手按《聖經》發誓，可見入會者大多數為基督徒或受西方文化影響甚深的人」。¹²²基督教會與近代中國改革和革命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牽涉對於宗教和世俗、信仰與教會、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諸方面，也不是本文的主題。但後人有理由認為，孫中山等革命者最終對基督教的信仰抱着真正的虔敬，「他臨終時表達了最後的願望：用基督教禮儀送終。孔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竊（黃宇和）以為孫中山的這個願望是出自肺腑的」。¹²³

似乎經歷了與耶穌一樣的心路歷程，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中，很多人也都是不被大眾所理解、甚至是被遺棄和被拒絕的人。宋耀如曾經於1915年8月3日寫了一封信給孫中山，當時他正因為宋慶齡欲與孫中山結婚一事極為不悅，即便如此，他仍然表達了對於孫中山的高度理解和同情，在談到「我們可能貧於物質，但我們既無貪心；更無野心，不大可能去做違背基督教教義的任何事情」。以後，他這樣寫道：

雖然有些人不會感謝您的志在創造偉大中國的努力，但是，我們屬於那些感謝您的工作的人們中的一部分。您生活在一個超前的世紀，因此很少人能夠理解您、感謝您如此熱愛，幾乎全心全意地進行的事業。中國不值得有您這樣一個兒子，但是未來會給您公平的評價，授予您榮譽，就像他們授予從前的改造者孔子一樣。孔子曾受到不道德的掌權者的驅逐。所以，您也被

121 陸燦，《我所認識的孫逸仙》，頁21。陸皓東甚至沒有留下任何遺骨，「親屬不敢領屍，惟有他遺下一牙，持此安葬於犁頭尖山下巡仔亭。陸皓東衣冠塚原在故鄉翠亨村附近之山門坳。1937年，中山縣縣長楊子毅主持，耗資六千三百七十元，修建陸皓東烈士墳場於翠亨村犁頭尖山南坡。」（同書頁91）

122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頁26，引自《國父年譜》（上冊），頁70。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540。

123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165。

驅逐，離開您愛得如此之深的土地。¹²⁴

孫中山曾對林百克說：「雖然中國是愚昧，他還是愛他。」¹²⁵其實，在孫中山及其周圍的羣體如海外歸國的留學生中，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在少數。著名的《中國留美幼童史》一書的作者美國人勒法吉在該書的後記中寫道：當他在1940年上海的一家飯店與這批留美學生聚餐時，他看到當年的那些留美學生都已經是「身着棉絲袍的中國長者，他們慣用着美國俗語及60年前（即1880年年代）在新英格蘭校園中贏得的綽號，互相招呼及寒暄」，「在和這些老紳士的談話中，使我了解到，在美國金色的年代對他們影響至大。現在，中國沿海大城市的留學生已經司空見慣。但他們於1881年（光緒七年）由美國返國時，實屬空前之事。他們與中國的生活方式涇渭分明，他們的教育又使他們成為自己國土上的陌生人。與他們交談，益感這種差異的存在。他們對中國竭盡忠誠，但仍被視為僱傭性的『外國顧問』。使我憶起容閱當年決定使他們飽受歐風美雨之薰陶，以便回華介紹西方科技時，得以承受中國保守力量的衝擊。」¹²⁶

最後，也是無疑地，在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的這個「混合社會」中，除了少數的買辦，絕大部分的人們都是真誠的愛國者，他們深受西方與中國之間的差距以後才立志改變現狀的。《國父年譜》記孫中山自檀香山歸國以後的感受曰：

先生自檀香山返抵翠亨村，闊別數載，一旦歸來與家人團聚，其樂可知。父母設筵相慶，頗望先生安守家園，以娛晚景，而先生殊快也。故鄉景物依然，……殊少變更。村民保守，安於天命，備受皂隸欺凌。鄉塾教讀，仍沿舊規，學童舍背誦強記外，殊少心智之啟迪。先生耳聞目睹，感觸頗深，乃決於市集要衝，行人麇集之區，宣傳改革，期能以振聾發聵。¹²⁷

124 楊天石，〈宋嘉樹與孫中山、宋慶齡的婚姻——讀宋嘉樹覆孫中山英文函〉，《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723。其實宋耀如本人未嘗不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人，顏永京牧師曾說：「可能我們站得太前面，走得太快了！」

125 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頁56。

126 勒法吉著，高宗魯譯，《中國留美幼童史》（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頁152-153。

127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33。

在這方面，宋耀如有着與孫中山相同的感受，當他剛從美國回到上海時，對另一位聖公會在上海的早期中國籍牧師顏永京說：

從美國歸來，我也曾鬱鬱寡歡，悶悶不樂，也曾再想去美國，平心而論，我好像都已經習慣了在美國的人。但我是上帝的僕人，是負有偉大責任的迷途羔羊的牧人。我還是一個中國人，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我要傳教，要佈道，要開導他們，要拯救他們。¹²⁸

難能可貴的是，這批人既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但他們並沒有喪失自己獨立的和批判的立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宋耀如是近代中國基督教當地語系化的最早的發起者，他與西方傳教士的衝突不應僅僅歸之於他倔強的個性，更重要的是他想建立一個當地語系化的中國教會而與西方在華的差會置於平等的地位。當時在上海與宋耀如同時代的聖公會顏永京及吳虹玉牧師都是同一類的教會當地語系化的先知先覺者。

無論如何，他們的行為都體現了對祖國的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從內心極為認同黃宇和先生的評斷，他說：

在中國近代史上，首批湧現出來的愛國主義者，是沿海通商口岸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其中不乏港澳的「番書仔」，「天無二日，人無二主」，這古訓誠然不錯，以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為代表的，在沿海通商口岸被教育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國家。他們從來沒有認賊作父，從來沒有把外國人當主子。¹²⁹

本文最後以費正清教授的論述作為結語：

近代中國的海上聯繫，不僅成為西方入侵的管道，而且也將一種新的領導方式引入了上海、天津、九江、漢口等新興口岸城市，愈來愈多的學生湧向日本和西方，探求拯救自己祖國的道路。在那裏，他們脫離了中國士大夫階級通常與之緊緊相聯的鄉土背景。中國的新的現代派一般都失去了他們的農業之根。最後，這種聯

128 于醒民、唐繼無，《宋氏家族第一人》。

129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頁190。黃先生還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先感覺到中國『現代化』的急切性者，皆首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熱血青年，他們覺得比諸西方列強，中國是太落後了，必須迎頭趕上，否則無法立足地球上。」見該書頁546。

繫都絕滅了。1895年以來年輕的國民黨革命者們都是典型的城市生活的產物，他們很少了解農村，在通過西方化拯救中國的努力過程中，他們掌握了西方學術和技術的許多內容。然而，他們也經常發現，自己脫離了中國的普通民眾。但儘管如此，他們關於立憲政府，關於中國控制鐵路建設，關於恢復因不平等條約而被削弱的主權要求，畢竟導致了滿清王朝和天子專制政治的滅亡。所有這些民族主義的要求都表現出外來的影響。¹³⁰

130 費正清，《劍橋中國近代史》，頁27。